

外国哲学研究

户坂润是如何兼收现象学与历史唯物论之美的?

徐英瑾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日本京都学派的成员之一户坂润是该学派少有的坚决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进步思想家。然而,与京都学派其他成员一样,他的学说与广义上的现象学运动之间亦有思想共鸣。户坂润的思想体系兼收现象学与历史唯物论之长的具体做法乃是建立起一种崭新的空间理论。该理论的具体思想要点包括:空间性要比时间性源始,像胡塞尔、海德格尔那样预设时间性的问题更本源乃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户坂的观点类似和辻哲郎);空间性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面相,但其中客观性面相具有更枢纽性的地位(因此,户坂润既不同意主流现象学家的空间观,也不赞同主流机械唯物主义的空间观);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方式乃是“今日”,而不是传统时间论所说的(作为瞬间的)“当下”,因为前者能够承载后者不能承载的人类的具身性与特定的社会内容。毋宁说,“今日”是具有双面相的:它既是一个可以被感性展现的现象学界面,又体现了这个界面背后的物理-经济-政治机制运作的信息。“今日”的双面相特征将便利我们在不放弃现象学分析的前提下,讨论传统现象学所力有不逮的话题,比如电影的图像呈现方式以及新闻媒体在“今日”发生的意识形态渗透作用。这一讨论又将为对于整个社会的马克思式病理学分析提供模板。“今日”的基础地位还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地位,由此便于我们向基于一种非批判的“历史时间观”的日本文化保守主义发出挑战,由此进一步防止这种保守主义观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有效补充。

【关键词】户坂润 京都学派 空间 今日 现象学 历史时间 意识形态

一、导论

户坂润(1900—1945,“户坂”是姓,全名之罗马字母写法是“Tosaka Jun”)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外围成员,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尽管部分西方评论者已经将其视为与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一个等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①,但无论是在我国的马哲界还是在西哲界,对于户坂哲学的研究还都非常相对边缘。在本文有限的

篇幅里,笔者将讨论户坂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他的“空间”理论是如何同时具有现象学与历史唯物论这两种貌似彼此冲突的性质的?

研究该问题的一般哲学史意义如下:我们都知道,“现象学研究”一般都具有“第一人称视角特征”,也就是说,现象学研究一般不涉及使得被涌现的现象得以可能的生理、物理以及经济、政治机制。与之相比,历史唯物论研究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则具有鲜明的“第三人称”视角特征——换言之,这种基于抽

[作者简介] 徐英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于通用人工智能与特定文化风土之间关系的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2BZX031)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探索研究 AI 伦理对科研环境的影响”(项目批准号:L2124040)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相关评论汇集于下述文集:*Tosaka Jun: a Critical Reader*, eds. Ken C. Kawashima, et al (Cornell East Asia Series, 2014)。这是英语世界研究户坂润思想的最重要参考资料,汇聚了户坂重要文献的英文节选译文与详细的评注。

象经济学范畴(货币、资本、流通、劳力等)的分析往往会将个体的主观现象感受加以边缘化。不少观察家都注意到,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往往交替体现出这两个面相:现象学的面相在马克思早期的《巴黎手稿》里扮演了醒目的角色,而客观主义面相则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因此,如何调和这两个面相之间的关系,甚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构来说,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而这个问题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亦是同样不可回避。一方面,在当时,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已经对整个日本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以至于像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九鬼周造等京都学派主流的哲学构建都带有浓重的现象学色彩;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日益崛起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法所能发挥的巨大方法论作用又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忽略的。那么,该如何兼收现象学与历史唯物论之美,由此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能够在不修正自己基本立场上具有与现象学相互抗衡的力量呢?——这就是京都学派的首席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曾经的学生户坂润所思考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户坂润曾在炮兵部队短暂服役期间苦思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时空问题,因此,基于时空问题展开哲学触角,便成为了户坂哲学的基本特征。同时,他几乎也是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从“空间”角度切入历史唯物论重构的思想家,在时间上要远早于后世的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不过,与行文晦涩的列斐伏尔不同,户坂润的行文带有一种惯常在英美分析哲学文献中才能看到的清晰性;与痴迷于城市地理学分析而哲学味略淡的哈维不同,户坂润的空间理论的哲学色彩又是不可质疑的。而户坂润之所以聚焦空间问题,除了个人炮兵军官经历的刺激外(炮兵毕竟是一个对空间计算非常敏感的兵种),也与当时他所面临的哲学形势有关。我们知道,时间问题乃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之枢纽,而和辻哲郎、九鬼周造等京都学派哲学家在批判性地发展海德格尔思想时,又往往试图通过重构“空间理论”以便为“时间理论”奠基。因此,提出一种能够为历史唯物论思想服务的新空间-时间理论,便能使得户坂润具有

与上述这些世界一流哲学家进行批判性对话的理论基础。

户坂润的空间-时间理论的核心要点有:

1. 空间性要比时间性源始,像胡塞尔、海德格尔那样预设时间性的问题更本源乃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户坂的观点类似于和辻哲郎)。

2. 空间性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面相,但其中客观性面相具有更枢纽性的地位(因此,户坂润既不同意主流现象学家的空间观,也不赞同主流机械唯物主义的空间观)。

3. 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方式乃是“今日”,而不是传统时间论所说的(作为瞬间的)“当下”,因为前者能够承载后者不能承载的人类的具身性与特定的社会内容。毋宁说,“今日”是具有双面相的:它既是一个可以被感性展现的现象学界面,又体现了这个界面背后的物理-经济-政治机制运作的信息。

4. “今日”的双面相特征将便利我们在不放弃现象学分析的前提下,讨论传统现象学所力有不逮的话题,比如电影的图像呈现方式以及新闻媒体在“今日”发生的意识形态渗透作用。这一讨论又将为对于整个社会的马克思式病理学分析提供模板。

5. “今日”的基础地位还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地位,由此便利我们向基于一种非批判的“历史时间观”的日本文化保守主义发出挑战,由此进一步防止这种保守主义观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有效补充。

下面便是笔者对于户坂上述观点的全面展开、解释与辩护。

二、户坂润空间-时间论概述

我们知道,将时间问题看得比空间问题更为源始,乃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大传统。对于该传统的最鲜明的体现便是笛卡尔哲学:根据笛卡尔的见解,我可以怀疑我不是在地球上,但是,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既然“在地球上”是一个空间性表述,而“我在怀疑”这个事件只能存在于时间之中,那么,上面的论述也就意味着:时间性比空间性来得更为源始。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种让时间性居先的传统思维方式竟然还感染了以批判笛卡尔主义为特色的海德格尔: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于“时间性”的奠基

就是以一种准笛卡尔的方式所进行的：当“此在”（Dasein）通过对于死的不可替代性的领域而悬置了“常人”（Das man）的俗见与闲谈之后（就像笛卡尔悬置了身体的空间性一样，“向死而生”这一面向未来的筹划本身就具有了一种不可褫夺的时间特征。所以，他的代表作的题目才叫《存在与时间》，而非《存在与空间》）。

户坂润则认为这所有关于时间的传统哲学说辞都是奠基在一种糟糕的隐喻之上的，即将时间比喻成意识之流。在1930年发表的论文《日常性的原理与历史时间》中，户坂写道：

现在，若吾辈设想一种“纯粹的”（？）^①时间——此时间并不具有或不能具有任何停顿——这便是一种纯粹的持续者。为何呢？因为一旦这种持续趋势被放缓了哪怕一点点，时间就会变得不那么纯粹了；这种迟缓会制造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空隙，以便让人觉得其中可能发生了一个断裂。这样的一种纯粹的（？）时间，或一种没有停顿的流，或许就是意识之流吧。但我还是首先要问：就“意识”这词的一般意义而言，意识真的在流动吗？我并不想由此说意识会停止。不过，很显然，说什么“意识在推进”之类的话，还是大致可以的——但这就意味着意识是一种流吗？若意识的连续统（此即“意识流”的技术化表述——译注）能够与数学中的实数的连续统等量齐观的话，那么，吾辈就永远不能使得该连续统中的两个点之间的质的差异变成问题。……因此，为了使得该话题能够成为问题，意识就不能以连续的方式流动，而只能以量子跃迁的方式移动——换言之，意识并不流动。于是我宣布：意识中的时间——现象学时间（也就是被想成是纯粹持续者）——并不存在。^②

为何意识不能是一种“流”呢？户坂的论证非常清楚：基于“流”之隐喻的时间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数学上的连续统，因此，时间中的这个点与那个点之间就

没有任何质的区别。但是既然现象学时间乃是心理学活动展开的场所，那么，心理学活动之间的差别就不可能是纯粹量的（而不是质的）差别（让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回忆上次一个人在札幌吃帝王蟹”与“期望求婚成功”这两种心理学活动之间的差别）。所以，心理学活动就不能以作为纯粹之流的现象学时间为自己的居所。而考虑到为心理活动提供居所乃是此类现象学时间的基本功能，我们不妨就干脆用“奥康姆剃刀”将对于此类现象学时间的哲学设定彻底删除算了。

不过，上述论证并不意味着一种并非基于“流”之隐喻的时间是不存在的。这当然是存在的——但在户坂润看来，它可能是以一种“量子跃迁”的方式存在——或说得更清楚一点，时间的演进是以“从一个话题突然转向另外一个话题”的方式来展开的，比如，从回想帝王蟹的味道一下子突然切入对于求婚策略的思考（顺便说一句，量子力学传入日本后，此类隐喻曾成为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口头禅，读者未必要从基础物理学的角度严格看待这些隐喻）。因此，时间活动又具有一种朝向“事”的面相。而对“事”的参与又往往是“具身性”的，比如，张嘴才能吃帝王蟹，下跪才能求婚，等等——因此，对于时间性问题的讨论将自然会我们将引向使得身体活动得以可能的空间性。户坂润沿着此思路写道：

我要警告读者的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对于当下的概念都是来自于现象学关于时间的概念。我们的意识或许真的存在于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中——但同样显然的是，我们的身体是不能这么存在的。^③

户坂润从心理时间到身体的注意力偏移，显然具有一种从观念论到唯物论的转向意味——因为作为主观观念论代表的笛卡尔恰恰是通过悬置“身体”来构建其“我思”哲学的。然而，户坂润并没有因此彻底消除其哲学中的现象学成分。具体而言，身体展开的空间既可以从日常的视角观之，也可以从几何学、物理学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因此，也应当存在着与这些视角对应的“日常空间”、“几何学空间”、“物

① 此问号日语原文就有，表示户坂润对“纯粹的”这一说法的有效性的怀疑。文中的加点着重号也是原文就有的。下同。

②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96页。

③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101页。

理学空间”、“心理学空间”等等。那么,其中哪种视角才具有基础性呢?在1936年发表的作为《现代唯物论讲义》之一部分的《空间论》中,户坂润以一种亲和于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方式认定:几何学空间、物理学空间、心理学空间均是日常空间的衍生物^①——他甚至在这个基础上引入了一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海德格尔“此在”(Dasein)概念的新哲学术语:“此性”(原文“Da-性格”^②)。不过,为了防止熟悉海德格尔的读者用“此在”的原意(即那种“能对存在的意义加以主观领会的特殊存在者”)直接去理解“此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户坂润立即开始强调“此性”概念的光谱毕竟是更接近于客观事物(而不是此在的主观领悟)的:

日常空间的“此性”具有一种特定的客观性。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考量一种人类学^③意义上的存在(或“此在”)——如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假若我们真的那么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会给予这个概念以主观的色彩了。不是这样的,毋宁说,此性在此提示了一种客观性——也就是说,空间性不能通过别的什么的东西而得到解释;空间性必须自己解释自己。这就提示了一种外在于主体并独立于主体的视角。就其最深远的哲学意义而言,这种客观性就是“物质”,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质料”。哲学意义上的物质可不是对“存在”另起的一个新名字;毋宁说,物质表达出了存在者一般(存在着的事件),以及“存在性”这东西本身。实际上,恰恰是这种物质,才是吾辈在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者。很明显,我们能够靠依赖这些物质而过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必首先与物理学家所说的原子(以及物质科学所描述的其它事项)打交道。这也就是说,日常空间无非就是实践的空间。^④

上段引文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户坂润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准现象学特色。就强调物质具有独立于人

类意识的客观独立性而言,户坂润的立场似乎接近于列宁的反映论;但是户坂立即强调他所说的“物质”概念是在实践范围内的,因此这个概念依然具有最起码的主观面相。换言之,物质必须以充满意识的身体为媒介,才能成为一个哲学上有意义的对象,也正因为这一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就不是机械的光源与反射光源的镜子之间的关系。由此,户坂立即将诸如原子这样的纯粹无法在身体界面上被感受到的物理学构造物排除出了他所说的“物质”的范围。而这种排除同时又具有空间-时间理论的意蕴:原子也好,电子也罢,毕竟都是无法在身体展开的时空维度中可以被直接展现的东西(它们的直观化模型则不论)。

似乎是担心读者觉得自己的上述基于日常实践活动的唯物论立场还显得过于抽象,户坂润立即引入了一些貌似非常普通的日常概念来为上述立场进行感性化的阐释,此即“今”与“今天”。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日语与汉语中,“今”的覆盖范围都有一种根据实际需要而被随时延展的特征(如“还看今朝”中的“今”)。因此,“今”的可延展性特征便使得其更接近于空间性。与之相比,“今天”的空间性特征则更为明显,因为我们显然是根据钟表的运作与昼夜的替换来界定“今天”与“明天”之间的界限的——同时,钟表运作与昼夜更替的必然性又使得户坂物质论的客观性能够得以展现。而这种客观性又绝对不是以一种主观性互相绝缘的方式出现的,因为进入公共语言的“今”与“今天”显然是人类组织劳动时必须依赖的语言媒介,因此是可以有一种最起码的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可感知性的(如果读者对此还不感到理解的话,就请看看你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显示——这难道不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可感知性吗?)。

尽管上面的讨论貌似还具有一种哲学上的抽象性,但“今天”在人类整个劳动历史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分工意义,使得户坂润立即意识到了“今天”对于劳工阶层的日常实践的基础性意义,以及“今”或“现在”对处于不同阶级地位中的人所具有的不同意义。他

①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260页。

② 在表述这个术语时,户坂润混用了德语“Da”与日本汉字。

③ 户坂润用“人类学”这个套子去概括海德格尔哲学,或许会让海德格尔专家不满,因为海氏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人类学。不过,参考上下文,户坂润的真实意思是说海氏哲学的主观意味还是太浓,对“物”的朝向性还不足。

④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263~264页。

写道：

到底是何种必然性统治了“今”或者“今天”呢？“今”或“今天”是被生活之实践的必然性所统治的。很可能事情是这样的：对于那些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来说，其闲暇充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至于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有很多“现在”与“当下”可以挥霍。这又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现在”——人们只有处于“现在”之中，“今天”这个概念才会对他们有意义^①——从来都没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妨碍。就算今天糟糕一点，明天或后天事情就会变得更好一点。与之相较，在一种更为宽广与更具实践意味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工作可是必须在今天完成的。因此，对其而言，“现在”这个概念必须被锱铢必较，因此也就转换成了“今天”……^②

很明显，在这段话中，户坂润做了一件几乎所有的主流现象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等）都未做过的事情，即将处于不同阶级地位上的历史主体的时-空感受之间的差异予以了揭露——与之相比，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海德格尔的“此在”与萨特的“自为存在”都是缺乏阶级规定与政治经济学内容的。但户坂润却发现这种对于阶级规定与政治经济学内容的“悬置”乃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使得时-空架构得以展开其现象学特征的最外部边界，恰恰就是由这些政治经济学要素所带来的必然性力量所规定的。因此，对于时空的现象学分析就无法摆脱对于这些政治经济学要素的考量，正如对于今日虚拟现实体验的讨论无法脱离对于特定虚拟现实设备的性能的讨论一样。

说到这一步，我们大致已经看出户坂润将现象学方法与历史唯物论合二为一的基本策略了。笔者将其基本步骤概括为以下七点：

第一，先对观念论版本的现象学入手，通过现象学分析指出：那种基于“流”之隐喻的时间观并不具有基础性——毋宁说，日常中的时间是围绕着特定外部事件而展开的身体行动规划，而且这些规划之间亦有质的差异。

第二，通过在上一步中引入的“具身性”，进一步

质疑其在意识流中的可存在性，由此引出空间相对于时间而言的原始性。

第三，通过引入“物质”概念，并借由“物质”与“空间”之间的天然联盟，由此进一步强化空间叙事相对于时间叙事而言的基础性。

第四，强调“物质”的日常实践性，由此使得“物质”之间的质的差异不至于被物理学的物质观所自带的同质性所取消——这样，“物质”之间的质的差异与“空间”片段之间的质的差异就能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物质-空间叙事。

第五，利用这种充满内部异质性的物质-空间叙事，反向重构一种新的时间叙事，由此构造出一个充满内部异质性的“今天”叙事。

第六，利用不同“今天”叙事之间的天然异质性，自然引出使得这种异质性得以浮现的阶级差异问题。

第七，通过对于阶级差异的问题的凸显，使得户坂润自身的空间论可以自然承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笔者认为，户坂润这种奇特的现象学方法（或者说，利用现象学的某些要素反对现象学的方法）乃是对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哲学方法的活用。我们知道，黑格尔版本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版本的现象学可是方向相反的：胡塞尔做的，乃是悬置一切超越性的设定（从物理学设定到经济学设定，不一而足），直面“括号”里留下的纯粹现象——黑格尔则反之，他是从最基础的现象（如“感性确定性”）开始攀爬，然后试图一步步从中找到超越这些现象的更超越的现象，以至一路攀爬到囊括一切现象的“绝对知识”（也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虽然黑格尔哲学攀爬的终点并不是作为无神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终点，但是在上述攀爬过程中，黑格尔对于诸多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经验成果——如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活动、主奴关系、自我麻痹的斯多葛主义、市民社会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特定意识形态——的考察，却的确构成了使得特定现象得以在视域中被展现的外部必然性条件。对于这些外部必然性条件的浓厚兴趣，显然也使得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高度的共鸣。

① 在日语中，“现在”或“今”的范围比“今天”来得更广，使用的灵活性也更强。

②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101~102页。

从这个角度看,既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能够容纳胡塞尔现象学所不能容纳的“超越性”内容,户坂润的空间理论显然也能具有类似的功能。

抑或我们也能用日本战后的著名分析哲学家大森庄藏的“叠加描绘”(重ね描き)概念解释户坂润的策略。^①“重ね描き”在日语中字面上的意思是指重新上色,或者指在先前的画上施加新的颜色以产生“若隐若现”之效果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在“叠加描绘”作业完成之后,最初的那一层底色并没有被完全地遮蔽,而是在施加在其自身之上的新色之覆盖下继续暧昧地展现着自身。大森利用“叠加描绘”这一术语阐释了三层语言之间的关系:现象学语言(描述“我”所看到的)、日常语言(描述“我们”所看到的)以及科学语言(描述科学共同体所看到的)。换言之,在具有胡塞尔情节的大森看来,即使你透过最上层的科学语言的界面,你也能若隐若现地看到位于“中间层”的日常语言与位于最底层的现象学语言的不少蛛丝马迹。如果户坂润或者黑格尔能够活着读到大森的叙述方案的话,他们或许会通过颠倒大森的三种语言的铺设次序而为自己的理论服务。他们会说:如果我们仅仅以现象语言为切入界面的话,我们就能从中隐隐看到已经铺设在下面的日常语言,并进一步看到铺设在最下面的科学语言(只不过户坂润会将这里的“科学”理解为政治经济学,而黑格尔会将这里的“科学”理解为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因此,现象学只是我们进入更为广阔的人类实践领域的入口罢了,而不是哲学的归宿。

不过,户坂润与黑格尔虽然可能以一种彼此类似的方式利用大森的“叠加描绘”叙事,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户坂润与黑格尔主义者之间的下述区别依然不容忽视:他高度关注使得特定现象特定浮现的物质性条件,而黑格尔则相对忽视这些因素。这种物质性条件又分为两类(尽管这二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考虑到在户坂润所处的时代,传媒技术已经得到了远超于马克思时代的发展,因此,户

坂润对于技术条件与现象之间关系的讨论便是以电影这种新传媒技术为聚焦点的。借此,我们也能更深入地理解户坂润是如何将第三人称视角的哲学分析与第一人称视角的现象学描述相互结合的。

三、兼收现象学描述与超越性分析之美的特定案例:户坂的电影认识论

户坂润兼收现象学与历史唯物论之美的哲学方案,直接影响了他的技术哲学观。在1933年发表的《技术哲学》一书^②中,户坂润反复重申了这样一个观点:技术不仅仅是纯粹的外在的物质配置方式或者是劳动组织方式,而且还牵涉到主观的技能获取——譬如,假若有一台高精度车床被运进厂房,却无人会操作之,我们就不能说这家工厂成功引入了相关的技术。从这个角度看,任何技术的运用都具有一个不可被消除的现象学面相。^③而这一面相不仅对技术产品的操作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对于技术产品的用户来说更是不可缺少的。譬如,对于电影技术来说,观众的现象学体验就构成了“电影播放活动”的一个本质环节。

在户坂润生活的时代,日本本土的电影业已经比较繁荣,而在日本全面向英美开战之前,东京等大城市的市民也能轻易看到西方电影。由于电影票价的相对低廉,这就使得观看电影这件事亦自然进入了户坂润的“日常性”叙事。同时,电影自身的展现方式也具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学特征:它能够在影院这个聚集大量观众的场所里批量生产出一种集体的现象学情绪,因此成为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工具。不过,与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代文化工业(当然这也包括电影业)的严峻批判态度相比,户坂润在1936年发表的《电影的写实特征与风俗性以及大众性》一文(收录于《思想与风俗》一书)中所表达的对于电影的态度则是相对比较宽容的。与本文论题特别相关的户坂润的电影观有如下两点:

论点一:电影对于视觉感知(而不是听觉感知)的

① 请参看笔者对于大森哲学的更详细的阐释论文:Yingjin Xu, “How Could Ōmori Shōzō Use Wittgenstein to Fight against Wittgenstein?” *Tetsugaku* 4 (2020): 7–24. 此文的网络公开下载地址是: <https://philosophy-japan.org/wpdata/wp-content/uploads/2020/06/Xu-Yingjin-2020.pdf>.

② 此书收于《户坂润全集·第2卷》(勤草書房1966)。

③ 顺便说一句,当时户坂润曾与另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相川春喜(1909—1953)展开论战——后者倾向于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技术的本质,并因此对户坂润技术观中的现象学残余表示不满。

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现象学空间的原始性，因此非常有资格成为一种与户坂空间论相匹配的技术-艺术哲学的切入点。或用户坂自己的话来说：

吾辈当然能够将具有真切的视觉感知与具有真切的听觉感知的人相区分。但在电影中，视觉所扮演的角色与听觉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于二者的比较都显得多余。我们自然不能忘记，在电影发展史中，有声电影是通过给画配音而造就的，而不是通过给音配画而造就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盲人的世界图景中，触觉的确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但触觉之特征毕竟更像视觉而不是听觉。视觉本身就具有了触觉以及爱抚的特征。与听觉所具有的时间延续性相比照，视觉具有一种空间延展之持续性……因此，我们就能说：对于实在的认知来说，与听觉相比，视觉就具有了一种基础性的意义。而正是电影，对视觉的基础性进行了强调。^①

户坂在这里给出的论证，需要加入一些现代认知科学的资料才能显得更为清晰。假若他换用更具科学意味的话语结构的话，他或许从以下四个方面为视觉表征的基础性地位进行辩护：首先，听觉与视觉相比，在获取的信息的颗粒度方面是全面败北的；其次，听觉在人类主体之间所扮演的重要沟通角色，往往得预设诸主体对于共通自然语言的习得——而视觉系统对于人类表情、动作的感知却未必需要主体了解被观察者的语言；其三，在物理对象本身不发声的情况下，听觉系统要获知物理对象的大小和远近等关键信息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我们能像蝙蝠那样，能够主动发出超声波以获取回声定位，我们也需要在“声波发送”这个环节上付出额外的生物学投入。与之相较，视网膜对于视觉图像的获取却是被动的，因为自然光线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视知觉的信息获取方式显然更能节省系统的运作资源。第四，听觉系统也无法辨别颜色，因此纯粹的听觉系统对物理世界的刻

画就存在着一个不可填补的漏洞。

很显然，上述论证已经将视觉的巨大认识论价值进一步兑现为了“视觉界面与实在之间的信息管道的相对通畅性”——或换用户坂自己的科学色彩更淡的话语来说，“呈现在荧幕上的内容乃是最具体的”^②，因此，看电影这个事情就“不仅仅是一种静观了，而是对于实际事物的一种处置方式”^③。或换用大森庄藏的语言来说，通过电影荧幕这一“叠加描绘”的现象学界面，我们更容易从中窥见在其背后若隐若现的社会实在。这个观点虽然貌似只具有纯学理意义，但户坂立即从中引申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政治哲学意味的结论：

论点二：正因为基于视觉的电影产品所表露的关于实在的信息更为丰富，因此，与别的媒介相比，电影更难以成为意识形态洗脑的工具——或者说，至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通过电影制造出一个“楚门的世界”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日本法西斯推行认知战的成本。户坂其实提出了三个具体的论点来支持这个推论：

1. 外国电影的国际性内容能够向日本观众展示与日本不同的另外的世界的样子，由此抵消本土电影的意识形态暗示，或用户坂自己的话来说，日本年轻一代更喜欢看外国电影（而不是本土的武士电影）这一事实，“意味着一种朝向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以至于进一步迈向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组织结构的精神运动”。^④

2. 商业电影的一个恒久主题乃是男欢女爱，或用户坂的话来说，就电影荧幕所展现出来的风俗而言，它是“通过两性关系之普遍性与人类相互联系的——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电影内容自身所占据的大众性的基础之一”。写到这里，熟稔德语的户坂甚至还玩起了德语词汇游戏（他指出，“人类”的德语表达“Menschengeschlecht”就包含表示“性别”的成分“Geschlecht”），以便由此提出“人类的类意识起源于两性关系”这一唯物论观点。^⑤ 由此不难推论出，由

①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4卷》（勤草书房1966），第283页。

②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284页。

③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283页。

④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288页。

⑤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288页。

于两性题材在世界电影中占据的高比例以及带来的“类意识”的高涨,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利用电影丑化敌对民族、破坏“类意识”的难度也会上升。

3. 作为电影的对比,户坂认为同样面对日常生活的新闻报纸的意识形态操控功能乃是更为明显的。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新闻的文字表述方式与实在距离较远,因此,虚假的新闻报道的制作成本也相对较低——但更为关键的是,与两性关系在电影内容中的压倒性地位相比,新闻报纸具有一个特点“无论现代媒体报纸多么追求新闻的覆盖面,在一种最狭义的与最基础的意义,政治事项的基础地位乃是不可动摇的。”^①该特点辅之以“新闻报纸变成了一种具有特定意识形态使用价值之商品”^②这一特点,自然就会产生下面这种化学反应效果:怎样的政治新闻能够被迅速“卖”出去,那么,怎样的政治新闻就会被作为商品立即炮制出来。而考虑到有太多的普通民众容易被“原始的本能与无训练的国家意识”所感染^③,渲染这些情绪的政治新闻——特别是炫耀日军之“武功”的新闻——自然也会被炮制出来。这当然不是说电影不能作为商品被卖出去,而是说:即使是作为商品,电影所产生的丰富视觉表征也总会向观众透露出一点实际信息(比如,即使是通过日本军方审核的反映侵华日军近况的新闻电影,也会展现出中国糟糕的道路状态给日军后勤所造成的困扰,以及广袤的中国领土带给日军的心理压力)。

户坂对于电影媒介的这种偏爱,表露出了一种类似于斯宾诺莎式“双面相论”的媒介观:既然人类可通达的事物的现象学界面与人类不能直接通达的事物的超现象属性均是属于同一个对象的,那么,现象学界面自身信息的丰富化,自然就意味着主体所获取的实在信息的丰富化。这种观点也顺便引出了一种对于黑格尔的唯心论美学观的唯物论反讽: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形式中的质料成分越高,其价值也就越低(因此,黑格尔喜欢诗歌甚于绘画,喜欢绘画甚于雕塑)——而户坂润却恰恰因为视觉表征中质料成分的丰富性而偏爱电影。

——有的读者或许会问:户坂润的这种预设了视觉基础性的电影观,在这个视频作伪电脑软件横行的当代是否还有意义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在当代的技术条件下,视频处理软件“无中生有”地产生出足以乱真的假视频的难度依然很大,成本也依然很高,而通过网络机器人在社交软件上大量生成虚假意见以推进认知战的成本则要低得多。同时,利用技术手段检测某段视频是否作伪的难度,也大大低于通过思辨鉴别某条假新闻的难度。从这个角度看,户坂润的建议依然没有过时:在信息获取方面占据天然劣势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多看少听”,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自己成为认知战牺牲品的概率。

不过,正如户坂润意识到的,即使是基于丰富视觉表征的电影,其被意识形态系统恶意操控的空间依然存在。或说得更宽泛一点,我们面对的整个日常世界都会被来自于意识形态系统的操控企图所污染。指出这一点,其实不是户坂润的首创哲学贡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预报了这一论点)——而户坂润的贡献体现在:他利用兼收现象学与唯物论之美的媒介理论,在他模拟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写就的著作《日本意识形态论——对于现代日本之日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批判》^④中,精彩地揭露了当时日本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机器是如何狡猾地将复古主义(日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化为己用的。

四、户坂润与“日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者的两线作战

我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架构的一个重要成分乃是日本文化优越论(户坂润冠之以“日本主义”之名),而此论的一个重要历史哲学预设就是:日本文化具有某种从古至今的连续性,并因此具有因为悠久性而自带的光环。在京都学派之中,和辻哲郎乃是宣传这种日本文化优越论的典型代表。户坂润则认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一种完全错误的时间观之上的。

①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288页。

②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138页。

③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138~139页。

④ 此书初版于1935年,收入了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2卷》第225~431页。

在他看来，历史时间是由一个个彼此断裂的时代（如日本史中的飞鸟时代、平安时代、奈良时代，等等）所构成的，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立的现象学操作界面，以及该界面所面对的特殊的历史实在。换言之，我们的“现在”并不是圣德太子或者德川家康的“现在”，因此，今日的日本人不必自作多情地认为他们的精神也在自己身上流传。或用户坂润本人更具思辨色彩的语言来说：

那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地在世上走一遭的乃是一种存在于历史时间中的“现在”——一种属于一个时代的现在，或者说，就是当代。当然，说什么“吾辈生活在当代”，并未给予我们太多特别新的教益。我想说的毋宁说就是这样的意思：当代乃是通过历史时间的片段化而得到浮现的一种特殊时代，因此，当代具有一种有限的持续（即非无限长或无限短的持续），而且，此种持续与数学中常数之持续是不同的。当代是一种特殊的时代，并受到以类似依赖性变项的方式而起作用的历史时间中的性格的影响。^①

请注意户坂的上述言论中的技术化隐喻：特定时代中的一些“依赖性变项”会对时代的现象学呈现方式产生影响，正如数学上的“自变量”对“应变变量”产生影响一样。很显然，这些变项自身的超越于现象的特征，便使得户坂的时代观的唯物论底色得到了凸显。在这个问题上，户坂润的时代观自然便与和辻哲郎的“风土论”产生了冲突。我们知道，和辻的“风土”概念指的是一个地域中能进入主体的现象学界面的地理环境要素与文化要素的总和。但户坂敏锐地意识到，和辻在这个题目下对于风土要素的讨论完全回避了那些不能直接进入现象学界面的地理学与经济学要素对于风土的影响，因此，这种讨论很容易错失那些影响特定时代之现象学特征的重大外部变量，而由此沉迷在对于特定文化风土的历史一致性的主观迷梦中。基于此观察，在《和辻博士·风土·日本》一文中，户坂尖锐地评价道：

“风土”这个概念真是一个值得如此被大肆强调的不可或缺的观念吗？对此问的最彻底的回答其实非常简单：风土论就是一种非常鄙俗的迷信——此论无非想说，对于日本之现实的分析来说，科学的分析方法乃是不适用的。^②

在引导读者将注意力转向那种与外部变量相联系的真正的“现在”（而不是日本的历史）之后，户坂润立即提醒读者注意到如下这个被主流京都学派无视的“房间内的大象”：日本关东军正非法占据着中国东北，并在别人的土地上横生是非。在《关于日常性》一文中（收入1936年发表的《作为文学之思想》），户坂润用嘲讽主流日本哲学家与文学家的笔调写道：

就拿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吧：满洲关东厅的警察部队与领事馆的总检察官之间发生了大决裂（伪满洲国的日本领事警察与关东厅警察由于隶属关系不同，职能也有重叠之处，经常为争夺领地互相撕咬，甚至有时候会惊动日本本土政府——译注）。若吾辈将我们的注意力仅仅局限于哲学的——在这个意义上，即形而上学的——研究之中的话，那么，若不将上述事件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自然也是完全可以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实际问题，因此，它还是不能被忽略的。假若那些当下的事件与实际的问题都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剥离掉，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没有任何内容了。因此，哲学也好，文学也罢，必须直面这一平凡的基本事实。^③

对于日本军警力量竟然能在海外执法（并不顾体面地互相撕咬）这一事实的聚焦，逼迫户坂反思使得这一现象得以被呈现的外部变量是什么，以及使得这些外部变量得以被进一步解释的理论资源究竟是什么。户坂最后发现，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本性，以及列宁对于帝国主义一般本性的理论阐述，就是他在此刻所要寻找的东西。换言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当下行为的解释，其实是不太需要用到关于日本

①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101页。

②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5卷》（勤草书房1966），第102页。

③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4卷》（勤草书房1966），第138页。

文化传统的解释资源的。在收录于前文所提到的《日本意识形态论》的《日本主义之归宿——从法西斯到皇道主义》一文中,户坂润就此话题写道:

当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帝国主义性质之后,其试图在国内通过国家强权掩饰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并在国际上建立起了这样一种观感:它能依靠强力解决这些问题。法西斯主义也便是这样一种政治机制:该机制为了实现上述功能,对小市民阶层——或广义上的中产阶级——进行利用。由于特定的国内事件与国际事件,这些小市民阶层的社会意识经历了动摇。他们在情感上既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相信资产阶级自己能够在日本全面掌权,于是,他们一厢情愿地幻想自己与法西斯主义者是分享共有利益的。而法西斯主义一边拓展金融资本的触角,一边利用中产阶级上述心态的策略,的确是对其比较有利的。^①

尽管户坂的上述理论表述采取了一种典型的列宁式修辞,但依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很显然,在这段引文中,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外,依然保有现象学描述技术的户坂还从心理角度分析了软弱的日本中产阶级的焦虑感的来源:自己既无力建立一套真正的资产阶级专政体制(顺便说一句,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发生之后,日本资产阶级的直接政治代表已大量被清洗,代之以横暴的军人专政),又基于其阶级本性,而不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建立反法西斯的同盟。而主要由日本军部构成的法西斯势力则利用了中产阶级恐惧无产阶级的心理,全面控制了他们的思想,将其转变为自己的同盟。

那么,日本中产阶级又有何软肋被日本法西斯所发现,以使得前者不得不对后者俯首帖耳呢?户坂润的答案是“家庭”。但为何是家庭呢?

从表面上看来,中产阶级的典型意识形态乃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又往往预设了个人的原子式存在方式;与之相较,“家庭”则展现出了一种微观的集体主义。但看得更深一点,中产阶级要完成

对于自己的生物学再生产,就必须依赖家庭——正因为如此,体现典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之内部构架的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毕竟还是将“伦理体系”的第一个环节定为“家庭”,并以此作为“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之正常运作的逻辑前提。另外,从户坂自己的“今天”现象学的角度看,中产阶级成员过的每一天,都是“为家庭”的每一天:早上离家上班,白天在公司为家庭工作,晚上则回家。家就是中产阶级的日常世界,而公司则是中产阶级为实现家的经济学存活而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因此,家的安全——这又可以被兑现为“稳定的工作”、“贤淑的妻子”、“健康快乐的孩子”等要素——便是中产阶级得以获取“个体自由感”的基本前提(顺便说一句,资产阶级的家庭观对于“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渴求,则体现了母亲在培养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资产阶级后备军方面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教育家市川源三[1874—1940]编写的作为资产阶级公民教育读本之一部分的《现代女性读本》一书中。户坂虽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市川,却对日本保守主义连这种有限的女权主义思想都要进行打压的做法表示不满^②)。

但万一这种安全感被破坏了呢?万一家的这种崩解,又进一步导致中产阶级对于未来的绝望呢?这会不会给躲藏于中产阶级之现象学界面之后的某些邪恶操控者以机会,使得他们可以将中产阶级引入“饮鸩止渴”的圈套呢?这便是户坂润提醒读者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产阶级基于家的日常世界的崩解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老板的一个请辞电话就足以促成这种崩溃。而在二十与三十年代,上述这种本来只是发生在个别中产阶级成员身上的悲剧,则因为下述四个因素的作用,而具有了向全社会蔓延的趋势:(甲)关东大地震所引发的经济后遗症;(乙)与黄金脱钩的日元在投机市场中的剧烈价值波动;(丙)“华盛顿会议”所催生的日本海军裁军计划对于日本造船业与钢铁业的暴击;(丁)1929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对于日本的外溢

①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2卷》(勤草书房1966),第322~323页。

②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312页。

效应(特别是对于日本出口与农业的打击)。家庭经济境遇的不稳定性,最后导致了中产阶级的现象学层面的不稳定性,由此催生了中产阶级的全面心理恐慌。

而在户坂润看来,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世界崩溃的同时,法西斯主义趁机开始用一种精神代用品来麻痹中产阶级。他给这种代用品的专用名词乃是“家族主义”。他写道:

家族主义自身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组织形态或国家组织形态。毋宁说,家族主义乃是一种驱使人们停留或回到家族系统中去的意识形态——不过,这又是一种对社会或者国家的组织形态有所言说的主义。^①

但在户坂润看来,“家族主义”与资产阶级家庭的关系,毕竟是“李鬼”与“李逵”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易卜生所批判的那种压榨女性的资产阶级家庭,毕竟是身为中产阶级成员的男性家长能够施展自由意志的场所,而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家族主义则会逼迫这些男性家长将自己的决策权上交给更上级的权威。这就结出了“统制主义”(其本质是一种取代自由经济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个恶果:

今日我们日本的家族主义(或是其模糊的意识)其实只是一种遁词,以使得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统制主义”这个新名目而得到维持——这种统制主义即使面对着家庭在现实中的不断崩解,也最终变成了社会-科学理解的权威见解。这种遁词之所以被设计出来,也便是为了方便将那些纯然鄙俗的内容以纯然鄙俗的方式吞咽下去。^②

而这种“李代桃僵”的游戏之所以能够成功,则是复古主义的混乱时间观对中产阶级进行长期认知战的结果:正是因为中产阶级接受的日本国史教育已经习惯于将古人的“今天”说成是“今天”了(以至于作为典型资产阶级革命的明治维新也被莫名其妙地说

成是“王政复古”^③),缺乏哲学反思力的中产阶级才会无法抵御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对于资产阶级家庭观的渗透。由此,户坂润对于日本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批判,就与其对于日本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相互接续上了。

不过,户坂润立即发现,国家资本主义与复古主义的结合,需要进一步的化学反应才能产生军国主义这个最终结果。这种反应的催化剂便是仇外情绪:只有仇外情绪才能使得一个国家不仅仅成为一个具有军队的国家,而且能够成为一支被伪装成国家的军队。那么,仇外情绪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答案非常令人震惊:反资本主义!户坂润写道:

家族主义是通过施加给人们下述幻想来使得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变得暧昧不清的——而这种幻想竟然具有与资本主义貌似相反的反资本主义外观:这样一来,今日发达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便变得更模糊了;毋宁说,它甚至呈现出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幻相。^④

或说得更清楚一点,家族主义的包装让中产阶级感到日本是一个超级大家庭(天皇自然是家长),这种虚假的温暖感让他们对自身的真实阶级地位毫无感知。相反,从这个“楚门的世界”出发去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赤裸裸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反而让其成为了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并因此成为了某种完全基于利益原则的冷酷的个人集合体。这种虚假的对比又让中产阶级产生了虚假的文化与道德自豪感,使得其觉得日本人有权利通过“近代的超克”来创制出一种比西方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而这种文明形态的强制传播方式,自然也就是战争了。

中产阶级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话术所俘虏的最鲜明的证据,便是京都学派的主流(西田几多郎、田边

①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313页。

②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3卷》(勤草书房1966),第313页。

③ 相关的日本历史背景知识如下:由于在江户时期,德川幕府已长期将天皇架空,反幕府的维新派人士便以“王政复古”的“大义名分”来打倒幕府。这一举措虽然在当时或许体现出了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机智,却给日本以后的政治操作带来隐患:因为“王政复古”的口号毕竟容易被真心实意的复古派所利用,由此反而会使得本来只是想拿鸡毛当令箭的日本资产阶级自身的手脚被捆住了。由此便产生了文化复古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在昭和时代所产下的畸形儿:法西斯主义。

④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第2卷》(勤草书房1966),第312页。

五、户坂润在何意义上是京都学派的成员？

本文已经从各个方面向读者展现了户坂润是如何在一种综合性的理论构造中兼收现象学与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优点的，并通过这种理论模型系统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劫持日本民意的意识形态操控技术。有鉴于日本语境中的现象学思潮与京都学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讨论一个衍生性的问题：户坂润到底算不算京都学派的成员？

之所以这个问题能够成为问题，乃是因为将户坂润归入京都学派与不归入京都学派的理由都同样强大。将其归入京都学派的理由是：他毕竟曾经受过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京都学派主流哲学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他自己对于空间问题的重视，显然在学理上呼应了西田几多郎的“场所”理论、和辻哲郎的“风土”理论、九鬼周造的“邂逅”叙事、三木清的“基础经验”概念等等（这些理论叙事显然也都带有空间因素）。而不将其纳入京都学派的理由则是：户坂润对主流京都学派成员都进行过辞锋锐利的批评，与“彼此协同工作、小骂大帮忙”的京都学派主流风格格格不入。将一个严厉批评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也纳入京都学派，似乎会让整个京都学派的学术谱系变得难以梳理。

而我个人认为，如何处理这个难题，主要应基于“今天”我们自身的学术需要。必须要看到，我们的“今天”并非户坂润的“今天”。在户坂润的时代，京

都学派右翼与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结合，自然使得作为左翼思想家的他肩负与之论战的紧迫历史使命。但在1945年死于日本法西斯之牢狱的户坂润毕竟无法看到日本投降后学术发展的新动向。日本战败后，京都学派右翼的代表田边元立即出版了他的《忏悔道哲学》对其战时言行进行反省，而另外一位右翼代表和辻哲郎则出版了畅销书《锁国》，对他曾经鼓吹过的日本文化优越论进行了反省（尽管这种反省也略带勉强）。至少与海德格尔在战后依然坚持不对其纳粹时期的反犹言行进行深刻反省的顽固态度相比，日本京都学派健在人员的政治态度转变要明显得多。此后，诸如西谷启治、上田闲照、大桥良介等战后活跃的京都学派成员已经有意识地脱离政治领域，而在纯粹形而上学与美学的领域展开学术工作，其成绩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我们也不妨在坚决摒弃京都学派主流战时错误言行的前提下，用更为包容的态度来面对京都学派思想中的合理内容。而在这种新背景下，将户坂润这条“鲶鱼”放入京都学派这个大池塘所能带来的积极意义也便变得更加明显了：户坂润将让我们看到用历史唯物论系统升级京都学派哲学叙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将最终使得作为欧陆现象学之东亚版本的京都学派哲学具有一种与第三人称哲学叙事彼此联结的新发展路向。考虑到广义上的自然主义思潮在“今日”世界哲学范围内的主流地位，上述彼此联结也将为东亚哲学资源与世界主流哲学话语的相互衔接提供新的机会。

How Can Tasaka Jun Embrace Both Phenomen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Xu Yingjin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s a typical Marxist, the Japanese philosopher Tasaka Jun is also regarded as a member of Kyoto School. Hence,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Tasaka's thoughts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which influenced the Kyoto School in a general sense. However, Tasaka owes his readers a further account of how to make phenomen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n his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such an account, he elaborates his theory of space, the main idea of which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5 tenets: (1) contrary to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Husserl and Heidegger, spatiality is more original than temporality, as what Watsuji Tetsurō strongly suggests. (2) Spatiality has dual-aspects, namely, the subjective one and the objective one, and the objective aspect of spatiality is more fundamental. In this sense, Tasaka rejects both the phenomenological notion of spatiality, which suspends objectivity, and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ist notion of spatiality, which excessively

marginalizes subjectivity. (3) In Tasaka's system, the junction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s nothing but "today," which has a phenomenological interface on the one hand, constrained by varieties of physical/sociological necessities on the other. Hence, different from "now," "today" could provide accesses to philosophical narratives making the notion "embodiment" and that of "social practice" significant. (4) The dual-aspect-based nature of "today" allows a theorist to handle issues which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phenomenology, especially the following problems: How to account for the picture-producing mechanism in the cinemas? How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ruling ideology influences today's political momentum in the public square? (5) The fundamentality of "today" also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historical time," and a thereby updat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could also help us to see through the tricks played by Japanese militaristic propagandists, who systematically confound "the historical time" with "today."

Keywords: Tasaka Jun; The Kyoto School; spatiality; today; phenomenology; the historical time; ideology

[责任编辑 晓 诚]

探寻中国政治逻辑 追求人类美好生活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政治逻辑”学术研讨会暨《政治逻辑》新书发布会综述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任务,复旦大学刘建军等主编的《政治逻辑》给予了回应。2023年6月17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政治逻辑”学术研讨会暨《政治逻辑》新书发布会于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国内的四十余名学者围绕该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民心政治”的政治形态逻辑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表明,中国政治逻辑异于西方政治逻辑。刘杰将凝聚核心的“和”与彰显众议的“分”视为中西政治逻辑的根本区别,王续添把“和”的政治形态释为“引领性、主导性、人民主体性和决定性相统一的中心主义”。

谁来引领新型政治形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政党的推动”,罗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主体。方雷和陈家喜分别从“党内民主带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党的自我革命”说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且作为引领者的机制。

二、“政通人和”的城市治理逻辑

人口规模使超大城市治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难题。彭勃指出,富人与穷人、大事和小事的矛盾是城市治理的主要矛盾,中国通过战略主动性、发展跨越性、统筹整体性、普惠共识性实现了“政通人和”的治理目标。

数字时代对作为城市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提出了要求。徐红认为,协同思维不充分、多元主体协同不足以及数据收集不畅是数字政府建设的缺陷,还需整体优化。

三、“理论创新”的话语逻辑

国家主体性、文化多样性与路径依赖性是现代性的世界意义。商红日指出,知识地方性与理念普遍性的冲突急需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来解决。刘伟认为,重视传统,拓展学科边界,立足中国经验才能理论创新。郭定平指出,推动政治逻辑与政治学逻辑互动;促进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统一;驱使党的创新理论和学术的理论创新融合仍需解决。

理论创新要为人类社会做贡献。杨雪冬指出,有效的学术传播需突出本国政治独特性且不失普遍性,以学术话语超越政治话语。王向民强调,理论创新与传播绝不是从“西方中心论”转向“中国中心论”。

费孝通曾问:如果东方拒绝现代化转型,将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既具现代化特征,也符合国情的答案。与会学者共同认为,“政治创造美好生活”是《政治逻辑》的点睛之笔,“实现人类美好生活”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还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只有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完善中国政治学自主体系,才能让中国智慧点亮世界。

(王 帅)